

~~第~~ 311

# 再生

日五十二月一年七卅 刊 週 期〇〇二第

號七〇七第照執理管政郵東川 類紙聞新類一第為認記登政郵華中 號四九五二第字警證記登誌雜部政內

## 社 言 裁員平議

收回港九，刻不容緩

從九龍慘案說到外人對華態度

論改革幣制

再論中國外交政策

新聞事業的新路

英首相艾特禮的中間路線

南美陰霾——阿根廷對坡里維亞的野心

中國歷史上之中央各部

· 余望之 ·

· 王厚生 ·

· 黃河清 ·

· 黃撼石 ·

· 黃一裳 ·

· 金治泰 ·

· 費雯 ·

· 杜衡 ·

再 生 出 版 社 發 行

上海愚園路四七號三十一號

(版出日期星逢)

(本期刊售價五元)

NATIONAL

# 社 言 裁 員 平 議

這次按照指數為公務員加薪辦法揭曉了，自然未能盡如人意，第一：以三十元那樣低的數目作基數，再來一個十分之一按指數，那十分之九呢，祇好應毋庸議了。第二：指數三個月一調整，公務員收入那抵得住波瀾壯闊的物價。所以在一種實現的悲哀中，才悟到所謂調整者，乃是裁長補短，調理而使之發齊而已。

辦法的特點乃是加薪與裁員平行實施，而有各機關逐月裁法百分之五，期能於六月止裁到四分之一之規定。原則上此舉我們比加薪還贊成，因為現在形勢變換，加薪已成為消極的敷藥消腫，而裁員却還含有積極的去腐生肌的意義。若果合理的裁，公平的裁，認真的裁，則未始非政府行憲之始一大善政。第一，合理的裁是要把各機關倒金字塔形式裏那些尸位素餐的高級員司先開刀，然後及於中下級比較有專事辦事不力的職員，現在一般機關裏的閒散人物，率皆使用着專門委員，專員，稽核，督導，顧問，編譯，審議等等隆重而典雅的名義，他們在辦公廳是一種游牧民族，或許連坐位都沒有，日常到班的工作，不外看報，寫私信，發請客帖，領薪水，同僚相聚，談談宦海祕聞，黃色消息，有時激昂慷慨，痛論時局，或播傳一些流言，似乎國亡無日。這種現象，自昔年北政府衙門已然，而今為烈，有些振作的長官，未始不看見他們頭痛，只因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問問這個，是某部長的內親，這個是某中委的舊雨，個個護手，徒喚奈何，為自己辦事效率起見，祇好另添一批類似這種職務，而真能為己用者，無怪愈聚愈眾，所以我們認為裁員不難，但應嚴格的規定，這一類高級員司，必須先整個法除。第二，公平的裁是關於技術方面，機關應無二致，國家銀行在幾個月前，因薪津將予以限制，上下皇皇，如大難之將至，結果據我們所知，其薪津之優異，名目之繁多，雖略經修正，仍斷非部署員司所可望其項背，至於年終獎金，消費福利，雖曠假不力者，亦絕無向隅，而其中間冗之多，考績之疏，又較部曹為甚，所以我們認為此次若談裁員，不能像滅薪那樣虛應故事，要裁大家都動手，同是為國家服務，根本沒有特殊化的存在。第三，認真的裁，是關於技術方面，每月百分之五是原則，主官平日的考核，到此時要拿出分量來，我們同意有些專家的看法，中國倍多人口，偌大地區，有公務員的經驗，有責任心，有久任心，是一部龐大的機器上的每一個配合的小零件，機器愈大，零件愈多，少掉一部分會使整個運轉失靈，我們政府則還未到這個程度，一部陳舊的機器，零件是雜湊的，或多或少，或小或大，有的生了鏽，磨了尖，缺了齒，反足為整個運轉的障礙。所以在量上中國的公務員誠須大量的增加，在質上今日却不能不先作一番機件檢查的淘汰與更換。我們以為認真的裁是要着眼於現有無靈的零件的棄除，和保留能為改善新配備時應用的成份。行政在今日已成了一種科學，不但資源的製造，水利等；需要千萬專門知識的公務員來設計、執行、監督、指導，就是日常公務，如公文整理，檔案分類，人事考成，在在不能不開科學的訓練與研究，否則這一部機器，祇有日趨陳舊敗壞，或畸形發展。現在談裁員，既不是為應付命令，像舞女抽籤那樣普泛處理，也不是憑幾個單位長官的直覺批評，主觀臆斷，親疏背景，我們要認真地以學識、能力、經驗、勞績四者來定標準。主管長官容有五日京兆之心，徇情怕事，自所難免，但這是國家行政的百年基業，培士的工作要一代一代傳下去，而這個責任是無可推諉的。

所謂百分之五的原則，在政府當另有補充，和慣例的通融，今日社會已視待遇枯薄之公務員為畏途，稍有出路，無不毅然捨之，固不待裁而始去，但也有一般敏感員司，平日缺乏背景，將來無業可轉，莫不惴惴然有行將及我之感，黨同伐異之徒，從而生風，其影響行政效率甚大，我們以為機關與機關事務繁簡不同，其工作成績，尤有軒輊，若是一個駢支冷廢的機關，理宜整個裁併，而且不應日後變象的又設置起來，若是一個實繁有實的機關，擴充之不遑，又豈可固於節約之旨，限期裁減，致使低能？這種遞減辦法，是取締性的，祇堪應用之於人力車夫，舞女、樂戶、鴉片癮徒，却不便殃及亂玉，施之於公務員的。

此日烽火遍全國，政府不顧軍費浩大的虛糜，而希望一般文官省吃儉用，其所能挹注者，微渺之極；不過若以至公之裁員方法，去蕪留菁，振挽近年來奄奄一息的行政效率，準備肩荷民主政治的艱鉅責任，我們是絕對贊成的。

平常心論之，事是一件好事，就有無好人來執行了。



以又議定「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碼頭一區，以便中國官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使城內中國官民，任便行走。將來中國建造鐵路至九龍英國管轄之界，則臨時商辦」。這已明白說明九龍城並不在租借地以內，專條又說：「在所展界內不可將居民壓令遷移產業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築造砲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應從公給價」。英帝國既越出了這條文的規定，壓迫居民遷移，復巧妙地把條文加以特殊解釋。因條文內本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他們的意思旁敲說一八九八年當時中國駐在九龍之官員可以執行公務，所以第二年英帝國把當時駐在九龍的滿清官員趕走以後，這就沒有中國政府的事了。英帝國一廂情願，竟開創世界外交史上的新鮮惡例，對於一國的領土主權，可以如此輕鬆地擅為己有，南非驚人之舉？

在香港政府九龍法庭審訊被捕居聯代表劉朱二人時，法官說「你們佔住政府公地，所以要拆你們的房子」。又說「九龍是香港地方之一部，沒有證據不是英國的土地」。香港政府硬把九龍與香港視為一體，想把六十年來一段侵略中國史寫得血赤淋漓，一無掩藏。一月十二日我外交部長王世杰向英大使施諾文交涉，嚴厲要求倫敦政府立即訓令香港總督葛量洪，在此交涉期間，對九龍城中止一切強制行動，並不再派遣警察進入該城，並促英方接受一月八日的抗議書，即「中國政府從未放棄對九龍之管轄權，根據一八九八年中英展拓界址專條，中國政府仍享有該九龍之管轄權，且絕無放棄該城管轄權之意」。並要求「英國政府重視中英兩國及其人民間素具之友好關係，中止香港政府繼續採取此項措施，立即飭令香港政府釋放被捕之居民代表，制止繼續逮捕並妥為安置此次遭受損失之居民」。我們政府的態度，也明朗化了。英帝國決不能以一八九八年香港拓界專條證明九龍城主權與治權應歸香港政府，已極明顯，反之，却祇有暴露了英帝國企圖製用最卑惡的征服殖民的暴行來加予我國人民罷了。

## 事態中的教訓

在這一重大外交事件突發與激變之中，我們看出了我們九龍城的同胞，具有至高無上的愛國精神，與可敬可佩的禦侮力量。當香港的武力逼入區內，槍口瞄向區內人民的時候，區內人民，能够在他們代表的領導之下

作合理的有力的抗爭，當被催淚彈迷的受難同胞，還死守着祖國的土地，不肯離去，當房屋全部被廢以後，還把祖國的青天白日旗插在儲存的字紙亭上。在法庭上居民代表對帝國的法官大聲呼喊「九龍城是中政府的土地，不是英國政府的土地」。替我們這個晦黯的國家爭得無限光榮，替鬱悶的同胞，吐出浩然的正氣。我們的同胞有組織，有熱忱，有志氣，有勇略，有愛國心，應該有資格做一等強國之民，但是我們的國家在國際壇上失落了「一等強國」的地位，甚至英帝國以此種對印度緬甸倚且不為的手段來對付我們，豈不令人感到這是創鉅痛深的襲擊嗎？

但，同時，我們又不能不指出政府方面辦事的欠缺效率，不能配合人民外交的步驟，外交部駐在兩廣的特派員郭德華，當時不能機警地主持外交折衝，香港政府的幫辦們已經乘車來到，動手動腳，我們的政府責任官員，却還要等「辦公時間」再說，這是官僚作風，現代國家的官員應重視行政的效率，應重視人民的需要，郭特派員在人民遭受強暴的危急狀態之時，還不忘「辦公時間」，這行動上已落在英國之後，我外交部王外長到十二日纔找英大使抗議，忍耐性亦不免過好。更奇怪的在上海的反映民意的報紙，禁若寒蟬，很少寫一篇抗議的社論，反之，却不忘於其球隊的「勝利」而自鳴得意。祇有廣州各報發表一篇聯合社論，主持正義，但僅廣州的報紙在吶喊，似有自認此為「地方事件」之嫌。我們認為這決不是地方事件，是國權的被侵犯，無論政府與人民，都得嚴正表示立場，予侵犯者以應得的猛烈回擊。這決不能因為我國國勢衰微，國際地位低落而須慎重考慮，或稍可隱忍的。

## 我們主張強硬外交

現在我們對於英帝國的要求。應不僅限於停止警察繼續進入九龍城，釋放被捕人民代表，賠償居民損失及安頓被難人等這幾點；我們已不能容忍英帝國憑滿清政府時代所訂的不平等條約來約束我國對香港九龍的領土主權的變更。廢除不平等條約，不僅以享有特權國家的自願放棄為限，倘然特權國家企圖享有不平等條約，我們主權國就應宣布廢止，監察委員于樹德梅公任等二十八人建議政府「即日以有效手段收回香港，廢止中英九龍半島租借條約，收回九龍半島，並要求英國政府賠償我居民因此次非

法行動。所受之一切損失，如英國仍繼續如前之事態發生，我政府即應一面以武力保護居民，一面進行強硬之交涉。收回港九，刻不容緩，國格是妥自己爭的，國際地位也是自己撐的，無效率，畏首畏尾的官僚作風，應該揚棄掉，莫讓他人更瞧不起我們進一步欺侮我們，也莫讓老百姓感到創鉅痛深的悲哀。

## 豈是第二「鴉片戰爭」？

筆者草本文既竟，本問題的演變却又在迅速發展，十六日廣州羣衆抗議港府強拆我九龍居民房屋事件的遊行示威中，發生羣衆焚燬英國總領事館，英國新聞處及怡和太古兩洋行的事件，各地學生也紛紛發動示威遊行，筆者所見上海方面的示威，學生的口號有「內戰內行，外交外行」。「打學生軍警千百，保九龍闖無一人」。「特務統治不能安內，奴才外交不能攘外」等口號，並夾雜「反內戰」「反英美」的口號，似乎有化對外為對內的傾向。同時英帝國已派淺水軍艦「珍珠港」號載軍官多人開赴廣州，驅逐艦「哈德號」亦準備開離。九龍方面，十五日港警限令九龍居民於一星期內遷出「騷事區」，否則即行「驅逐出境」。英帝國悍然不惜擴大侵略，毫無悔禍之意，已昭然若揭。而我國內民氣沸騰，本來可作政府強硬外交的後盾，但目前的情形完全相反。勢必促政府一面竭力保護英美僑民，一面又竭力彈壓愛國運動。從這裏看問題的癥結，還不簡單，政府之不能攘外，必促使更不能安內，不能安內，愈將不能攘外，結果外侮日深，內亂日亟，這是一個「大崩潰」的前奏曲。我們得向政府忠告與其恐懼於羣衆的行動，不如全力攘外，不安於國內的禍亂，不如振刷內政。

## 從九龍慘案說到外人對華態度

· 王厚生 ·

本月五日侵晨，香港政府命令武裝警察別動隊約二百五十人。攜帶盾牌，防毒面具，催淚彈等，在代理警察總監史巴路之率領下，由十餘輛警車為前導，衝入九龍城區，企圖用暴拆毀居民木屋，居民不服，英警竟開鎗擊傷我居民，施放催淚彈，捕扣居民協會主席朱沛堂、代表劉毅夫。六

內政為外交基礎」，固為至理名言，但此所謂「內政」，決非國內一無反對政府政策之謂，政治之道在「妥協」而不在「鬥爭」，國內政治家門爭意識尖銳，遂忽於妥協之重要，政府以尖銳意識反共防蘇，學生羣衆以尖銳意識反抗政府，以致「對外」事件竟以「對內」為目標，政府以較大努力力遏愛國運動，而忽視攘外之緊急重大任務，學生反對政府為根本而忽略外侮之來，已因而愈酷愈亟。這是中國的悲劇，是中國人民的悲劇。

九龍事件可能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事件，鴉片之戰，英帝國揭開了近百年來中國外侮屈辱史的首章，而九龍事件無疑地又是英帝國試探第二次大戰勝利以後的中國這「紙老虎」。記着：處理九龍事件的一切成敗，可以決定國民政府今日的命運，猶如清廷處理鴉片戰爭的一切成敗，決定了清廷的命運一般。歷史雖不一定重演，但我們朝野的人們，似乎缺乏接受歷史教訓的誠意與努力，所以前途必然非常悲觀，非常黯淡。

總之，對外問題，不能硬扭振轉化為對內！收回港九，刻不容緩！我們呼籲朝野，正視現實，帝國主義者對待弱小民族的手段與方法，始終是不變的，我們不能說「鴉片之戰」與「五卅慘案」「江森條約」等一類的東西，不會重演於今日，這種樂觀與自信是太危險了。同時轉移對外為對內，辛亥革命，雖然可以推翻滿清，但何嘗取消得帝國主義不平等條件的束縛？今日我們在野的愛國者或革命者斷不能說推翻了這個政府就算，對外的辦法，仍當佔重要工作部門，然則今日的愛國運動，又何以轉化為對內即可解決？如果朝野都能接受歷史教訓正視現實，一致對外，抗議英帝國收回港九；好比過去八年抗戰，對外的抗爭，就必能取消不平等條約，就能提高國家的地位，鞏固國家的根基。

日晨，武裝警察復至城區，續將五日未拆完之居民木屋，全部拆光，并限居民於一星期內全部撤離，否則施加武力。被捕代表朱沛堂且加手鐐，於六日晨在九龍法庭，首次公審。據大公報香港十日專電，當時審訊之情形如下：

法官問朱沛堂服罪否，朱答我不知道所犯何罪，更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法官答：這是法庭，因你煽動羣衆妨礙警察職務，所以將你拘捕。朱說：九龍城是誰的土地？何以要拆我房屋？法官說：你們居住政府公地，所以要拆。朱高聲喊：政府公地到底是中國政府還是英國政府？法官想了一下說：是香港地方之一部九龍城。朱說：沒有證據不是英國土地，我沒有看過簽訂的條約。法官問：但是你服罪否？朱說：地方是中國政府的，你拆我房屋，我們自然反對。我沒有罪，如要判罪，乃是你們的事。法官轉向劉毅夫問，所供與朱大致相同。此案將定期再審。

九龍城內，二千餘名同胞從此無家可歸，露天露宿，兒啼妻泣，其狀殊慘。全國各地，聆此消息後，人人激憤，輿論譁然，誓爲我二千餘九龍城受難同胞後盾，嚴重向英國政府此種殘暴不人道與侵犯我領土主權之卑劣行爲抗議，除各地紛紛馳電政府，請收回香港九龍領土外，并向英國大使館提出書面口頭之抗議。十六日廣州民衆首先舉行示威遊行，並至沙面縱火焚燒英國領事館。十七日上海市學生搶救民族危機抗議九龍舉行聯合會，響應廣州民衆行動，向英國駐滬領事館，舉行示威大遊行，參加學校單位七十餘人，學生二萬餘人。英國政府既敢佔我領土，民衆運動自極應當，并且英人一日不退出我國領土，我人應進一步擴大爲全國性運動，以達最後收復國土之目的。

九龍慘案是我國擊敗日寇，廢除不平等條約後之慘案，我們應該深切認清爲便利「毒」起見，而用武力脅迫滿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的英國人，我們還應就此慘案發生之前與事後的情況，加以研究，并注意其發展。早在去年年底，十一月二十七日，香港政府曾通告九龍城二千居民，令速遷移，并以十二月十一日爲限期。此後，九龍居民乃向政府請願，請求保護，並宣言誓死不遷。政府方面似亦曾派遣代表，前往談判，但遭香港政府拒絕，沒有積極進行談判。致此二千餘居民生存放倒之外九龍問題久懸不決。終至五日清晨，英國政府親視我國政府，不願循外交途徑解決，實行強制拆屋，釀成血案，所以此次慘案，英國政府固須負全部責任，但我國外交當局事先對此問題之淡漠擱置態度，也使我们非常不滿意。再說，九龍爲我國領土，何以政府在該地無行政機關及警察之設置？等到英國武裝警察衝入之時，沒有一個可以代表政府同英警察交涉之官吏，而由居民

代表朱沛堂，劉毅夫等在城區內狂奔走呼號，勸導居民鎮定抵抗之責。當九龍城秩序混亂，英警向手無寸鐵之居民射擊之時，何以不見中國警察出來維持秩序？如果有警察，何故不抵抗還擊？何以六日再任英警察而皇之開進國境，強拆民房，驅散居民，施放催淚彈，就地開庭審訊居民代表？所以此次慘案，英國政府固須負全部責任，但除我國政府辦理外交，頗令我們失望外，我們且十分懷疑政府心目中是不是還有「九龍」這塊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土。

外交部兩廣特派員郭德華在此次慘案中，所表現的漠不關心及不力的態度，我們需要特別舉出來。這要先引大公報五日香港通信的最末一段：「……有一位居民在無援的狀態下，七點鐘打電話給外交部特派員辦事處，電話鈴響了十五分鐘都沒有接。接着又打電話給特派員郭德華公館，一個人用接電話，那位居民想直接將這消息告訴郭特派員，但這九龍城拆屋的消息對於郭德華并不比早上的睡醒更重要。用人回答他說：九點鐘到了寫字間再說。事後居民代表陳振洲，張宗武到特派員辦事處報告，據辦事處發言人說：拆屋情形已悉，擬報議候示」。一面是居民在仇恨中，以石子與敵人對抗，在鎗聲中流血哀號的鏡頭，一面則是郭特派員的甜密早睡與悠閑的情境。英國人要來拆房屋，郭特派員在事先想不至於不知道，拆屋消息來時，郭特派員竟以優哉游哉的態度對之。九龍是中華民國的國土，郭特派員是外交部兩廣負責人，想也不至於不知道，國土，主權受外人侵犯，不立刻提出抗議，却「擬報議候示」，一個外交部的特派員，當發生此類問題時，難道連先提抗議，再「報部候示」的權力都沒有嗎？又難道郭特派員心目中，外交部對此種國土主權受侵害之事，不致提抗議嗎？大公報六日香港通信中又有下面的報導：「……在五日被拆的一天，九龍城居民代表下午三次電外交部辦事處，請求派員到城，然終無效果。……六日早晨九龍城居民決定要渡海到外交部特派員辦事處請願，重求郭德華明確表示對港府交涉的結果，是否仍在交涉中，或者已經交涉失敗？居民代表陳振洲說：我們既然已經無家可歸，現在祇好拖男帶女到特派員郭德華的辦事處去住」。從這段報導中，可見郭德華是如何在兩廣玩忽其外交使命的。他是現在特派員，是吃公糧的官吏，至少還背「報部候示」，如果他不是特派員，此次慘案發生後，全國人都表示憤慨，唯他不抱同情。試



想這類特派員，要來何用？

事後的發展，就是廣州民衆的示威遊行，焚燒沙而英國領事館。此事引起三個後果：①政府立即向英國大使館道歉；②批評民衆之越軌行動；③說有奸徒不良分子混雜其間。就這三個後果，再加討論。民衆有越軌行動，政府表示道歉，推說有奸徒不良分子混雜其間。在政府，如此說法不失爲一種策略，但稍加思索，政府毋須採取此種軟弱的策略，不妨可以置之不理，因爲英國警察既擊我居民在先，侵犯我領土主權，違法國際公法，民衆爲包復起見。自然出此舉動，一切責任亦自應由英國負担。

至八日，外交部以書面向英國政府提出抗議，英國大使施諦文解釋於一八九八年所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之「中國官員」指爲「滿清官員」，施諦文氏既將「中國官員」指爲「滿清官員」，我們提出兩個問題，請施諦文氏解答：

一、「中國官員」即「滿清官員」，則「中國政府」即「滿清政府」乎？

二、施諦文氏代表英王來華向何人呈遞國書？施諦文氏是否已切實承認由蔣主席領導之國民政府？

明白地說，滿清覆亡已有三十餘年，所有在滿清政府時代與外國簽訂之條約，中國政府僅在道義上，自願表示遵守，而無法律上的約束，今施諦文氏尙念念不忘於滿清官員，我自不願再遵守條約，并且根本不承認此項條約之效力，要求立刻歸還香港九龍。

九龍慘案尙在發展，未至解決階段，我們一面注意其發展，堅決要求收回港九，一面要把勝利後，英國對我國之態度，及幾件重要外交事件舉出來，加以檢討，以爲國人警惕。

勝利以後，第一件外交上的重要事件，即是蘇聯軍隊之未能依限期撤退東九省及交還旅順大連，這件事，政府盡了許多努力與蘇聯政府交涉，國內的輿情也非常憤懣，各地學生也有大規模的示威運動。雖然，蘇聯軍隊後來分期全部退出東九省，但旅順大連之接收至今未成事實，仍在蘇聯人管轄之下，旅順港船隻之進出也須經蘇聯當局之檢查及准許，否則即予扣留。蘇聯政府在東方，常說出某地某項權益爲俄國沙皇時代已經保有，

今日必須加以收回。這種論調，與英大使施諦文氏指專條中「中國官員」即「滿清官員」相同。蘇聯革命後，否認所有帝俄時代與外國訂立條約所負担之義務，一切外債公債概不償還，現在蘇聯却要在東方收回帝俄時代強取的權益，這不是「強權外交」是什麼？

接着第二件事是上海黃浦江上法國兵艦，不經我國政府之准許，擅載戰犯兩名回國，引起軒然大波，學生結隊遊行到法國領事館，提出抗議，政府雖也會與法方進行交涉，但結果仍歸失敗，法國兵艦載了戰犯揚長而去。此事發生後不久，法國人竟派遣艦艇，在西沙羣島實行武裝登陸，又激起國人公憤，要求政府採取強硬外交，收回領土，政府照例與法方進行交涉，報章雜誌紛紛著文，并引證歷史，指出西沙羣島確屬我國領土，但此事至今尙未解決，成爲懸案。

「中美商約」成立後，國內大起騷動，咸認「中美商約」爲一喪權辱國之條約，各界提出反對，認爲我國工商業落後，斷難與美國進行「平等」與「互惠」之貿易，今政府不但不設法保護國內幼稚民族工業，反作繭自縛，受條約上之拘束。此事學術與工業界反對最烈，但中美商約之全部內容，事先外界知者甚少，特簽字公佈後，若再行廢約，在政府認爲破壞中美邦交，礙難照辦，這個條約之訂立，政府分明犯了兩大錯誤：①採取秘密外交；②上了美國自由貿易，廢除關稅壁壘之當。并且上當在不知不覺中，或自甘情願，在一般民衆的腦海中也很清楚。

「中美商約」過後，就有北平沈崇案之發生，此一事件，國內激昂之憤憤更甚，學生之示威遊行運動，洶湧澎湃遍及全國，當局無法不注意此一事件之發展。北平美軍乃開軍事法庭庭，審訊兇手，結果以判處數年有期徒刑了事，一面解除該兇手軍職，但該兇手回到美國後，美國法庭即宣布其無罪，使該兇手仍得逍遙法外，這與美國派遣在日本之佔領軍，因強姦日本船戶之女，而判處死刑者相較，豈不是鴻毛與泰山之比。

總而言之，在第二次大戰中，我們中國最早於一九三七年即與侵略野心家相搏，中間數年完全憑自力與日人對抗，一無外援，不但無外援，英國人反作出封鎖漢口津浦線的舉動，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美始向日本正式作戰，一面是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在國會中攻擊中國作戰不力，發出失望之語，一面却是我國遠征軍在緬甸解圍英軍及收復

緬甸的偉大戰績。日本投降後，不平等條約算是取消了，我國也跨於強國之列，但是回憶勝利後幾件外國侵犯我國權益，輕視我國地位及這次九龍慘案，他們以往對我們的態度沒有大的改變，並且還有企圖恢復戰前在華特種的跡象。於此，特提出兩個意思，祈國人外人共察之：

- 一、自己國家無辦法，人民不警覺，四面皆是豺狼，隨時可以發生問題。
- 二、倡言國際和平的國家，自己不身體力行，尊重他人，則世界永無寧日。

# 論 改 革 幣 制

· 黃河清 ·

貨幣是社會進化到商業社會的產物，代替物交換出現的一種媒介物。它能夠交換手段，代表一定的商品價值，成為簡易的一種符號。然而在本質上說，為了它是一切商品物價的衡量標準，它本身必具備一種超越普通商品的素質，而有其可珍貴的地方。商業經濟發展的結果，以信用代替金銀，並形成資本的變相代理者。

依交換而言，貨幣價值之升降與幣值極少關係。反之貨幣之數量與流通率，則為決定的因素。譬如說：流通量增加，則幣值被貶，流通量減少，則幣值提高，這是通常的現象。準是，貨幣量之大小，與物價之漲落成正比。與幣值成反比。惟貨幣尤其是紙幣，在通貨原理上是專靠信用維持物價與幣值之聯繫的，本身的担保，所謂準備金，並不能起什麼作用。量的增加，即表示信用的減少，即足以動搖固有衡量物價的標準。所以數量的增多，或票面數字的加大，都在說明「信用膨脹」，使貨幣的使用者，持有者發生信用的降低。而增加其流通速度。故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常因生產與消費關係的不相應。分配手段的不正常，予交易場合一反常投機牟利的行為機會，使交易媒介貨幣因此也同樣發生商品價格變動

。貨幣失却信用，商人的收斂心理轉到貨物，貨幣的流通率與物價的波動相為因果。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金融企業化。生產手段與經濟權柄為少數人所壟斷，談不到幣制的徹底改革，貨幣價值的永久不變。因為資本家以貨幣為攫取社會財富唯一手段，以貨幣為通過生產市場牟利必要工具，貨幣在國民經濟活動中，是畸形的存在發展。貨幣變為政治的開拓者，一般人民生活，商品交易，都取決於資本家的經濟支配，政治的強力實行。所以近代的兌換紙幣與不兌換紙幣，各國都同一感到未能保持恆準平衡。相反的這裏基本上就缺乏信用，尤其是政治信用。所以，人民使用它的使用價值是不得已，對它的交換價值。則未免懷疑而存觀望。這是極顯明的事實。在外國，政府發行通貨，硬幣的幣材比例，或紙幣數量與準備金的比例，多為固定的。而且必須通過國會的許可，公之於民。使人民瞭解貨幣流通的數量，決定它對物價保持的聯繫比例。所以外國資本家攫取的財富利潤，政府課取人民的稅額收益，都瞞不過人民的耳目。社會經濟物價變動，所以永久不會劇烈，那是當然的。

放棄了硬幣制度，改取不兌換紙幣制度。是一個大變動。正為如此。貨幣的價值不僅全賴信用維持，且與政治波瀾發生密切關係。前者由銀行事業，金融管理的得手，後者由政治穩定，財政充裕，所以暫時保持幣值的原位。它是否產生過促進生產，增加社會財富的積極效能。不但沒有，而且從那時起一九三七年中間，購買力愈加低落。實際僅予資本家與政府一活動便利。從那時起，人民對「法幣」的「法」字只認為是一種拘束，並不是信用的表示。對法幣的信用發生兩種疑問：一是準備金的問題，二是發行量的問題。抗戰之後，到今天，十年間的變動，政府對此二者愈諱莫如深，人民愈不信任。當然，這不是無理由的。濫發紙幣的惡果，給市場的刺激，人民生活上的打擊，直接影響到對政府的信心，這第二種信用亦為之動搖，市場交易焉能不亂。物價隨通貨信用的膨脹而奔騰，雖實超過貨幣量數數千百倍，但沒有信用的貨幣，無論怎樣增加頭寸，也難應付市場的要求。由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七年，三年中通貨票面加到一百倍，而物價則漲至二百倍以上。這個短的時期如此大的劇變，釀成法幣信用全面的破產。說來確實驚人。

我國自一九三五年實行「法幣」之後，貨幣政策

我國自一九三五年實行「法幣」之後，貨幣政策

我國自一九三五年實行「法幣」之後，貨幣政策



為了挽救信用的崩潰，近一年來許多社會人士在研討改革幣制。有的主張「金本位」以與金元聯繫，從國際貿易外匯的角度謀出路；有的主張「銀本位」，以銀質硬幣恢復信用。但這裏的問題却非常明顯，無論金銀，如改採硬幣準備制，非與紙幣保持一定兌換比例不可，且有一定之準備。依事實而論，我國如此則皆須取給於美國。因為我們在金銀的存量上已成了真空。那時即使幣制改革，我國則有陷於美國金元附庸的危險。

我國財政與市場物價失去自主性而為外國所決定。這是頗值考慮的事實。他方面，假如準備金不充足，不堪充分兌現，此項準備金不能流通市場，則暗地可能復又變為豪門搜集吸存的目標。結果新貨幣又成廢紙。還是沒有信用以鞏固其交換價值。所以改革幣制殊多困難。至於「金本位」與「銀本位」的選擇採用問題，依理論以觀固無大出入。今日世界貨幣已非硬幣時代，基本問題是以金銀準備量與物資財富充裕與否以為斷。

即使貨幣獲得一時的穩定，而國家缺乏物資財富對外貿易漏厄日多，則國民經濟實質益形虛弱。只有貨幣沒有物資，物價與幣值依舊難保平衡。物資的使用價值生產價值，通過不正常的交換與分配，仍難期與消費價格不脫節。勢之所趨，小量金銀與物資仍為國民儲藏追求信賴的目標，故不求生產，增加國民財富，妄圖借外債以平抑幣值，改革幣制，根本是捨本齊末的看法。

## 再論中國外交政策

· 黃蘊石 ·

筆者於去年十二月中曾四次連續寫了中國外交政策諸問題一文，對於中國在外交上應當採取什麼態度？如何才能形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及我們應當怎樣去對付美蘇兩國等等問題，都作過了扼要的闡明。這裏，我們因感於現實的需要，再把論題轉到英國。

英國，這個西方古舊的帝國，無論在歷史上，文化上都不能和東方的中國相提並論，她之所以被稱為「古舊」，乃是由於地理所造成許多島國人民的屬性有以致之，她的保守狹窄，「唯利是圖」的種種原因，促使不列顛帝國失掉在新世界的過程中一種，「適應」的能力，於是跟着這次戰爭的結束，英國傳統的「尊嚴」也結束了。

當鴉片戰爭擊破中國素來關閉的大門後，它給予這個東方的古國帶來了一種劇烈的變化，一個世紀以來，鐵路輪船的文明，民族革命的勃興，以及買辦階級的長成，雖然不能使我們在這萬花撩亂的情景中輕易地決定它的功過，但是，我們畢竟可以這樣說：英國自擊敗西班牙無敵的艦隊而掌握海上的霸權後，這是她對於東方的侵入一次最大企圖的嘗試，俾俾她是勝利了，南京條約所給予英國的種種權益，確立了東方處於威力下大規模剝削的殖民地。其次，英國人生性的頑固，在十八世紀工業落後的

國家中也是一種最有力的武器，舉例來說，英國的商人頑固地不肯學習半句外國語，結果英語在各地便普遍起來。他們這種頑固的性格，由來已久，所以不管是保守黨執政或工黨執政，英國對於外交政策所能改變的僅是形式而不是實際。

「佔先」的觀念，加上不講邏輯的態度和自然的限制，再加上許多不可思議的心理因素，構成了英國的政策一個最現實不檢討的國家。遠者不提，我們只要把九一八事變以來，英國對華的政策略加檢討，我們就會發覺，她在遠東所運用「均勢」政策的老套，較之在歐洲並沒有什麼不同的處。

日本侵入東三省，正是英國想釀成日俄衝突的機會，所以對於美國的磨拳擦掌不感到興趣，等到民國廿一年滬戰爆發，那就非同小可了。益有進者，英國人的性格還慣於屈受侮辱：當時天津日本的反英運動，撕毀英國的國旗，擱置英國的婦女，克萊琪（當時英駐日大使）還把它輕描淡寫地說是「誤會」，以後天津白銀的封存，漢口鐵路的路權，（當時中國運口頭的抗議都沒有），蒙巴頓將軍的裝模作樣，無一不是表示英國每當歐洲局勢緊張的時候，只有對日本採取屈膝的一條路。他們對於中國以往的抗戰，可以說是既不「友誼」也不「得義」，因為現實的政策已被認為政治上

的謹慎，英國人從不懂的全體戰的嚴重經驗，以及他們真正和求久的利益到底是在那裏。

懂得國際政治變動的方向，就懂得英國對華的外交政策，但這却不一定就是說，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找出一套對付的方法。目前有許多人都以為，英國在遠東已成爲太陽下的星光，這句話只有表面上是對的，其實，英國的政策，還是在積極地鼓勵美國游移不定的意志向中國北部擴張。美蘇的磨擦多一分，蘇聯對於印度的注意力就減少一分，國共一日不團結，香港的問題就可以高枕無憂，同時，對於荷屬東印度「取而代之」的願望也可以不受中美的反對，由此看來，我們愈能够從真正的遠景裏，清楚地看出我們和英國對敵之點在什麼地方，我們就會衝破百年來由於懦弱的外交所造成的無知的幻景，而建立起來一個堅強的對英外交政策。

現在，香港和九龍的問題就是中國對英外交是否會發生轉變的一個重要的關鍵。無論是心理上，歷史上，或是經濟和地理上，我們總不能否認這個問題是中國被稱爲五強之一後，在境內所留下最後一個的帝國主義者有形的割據。中國政府對於討還九龍和香港，僅僅保留着一種「提出」討論的權利，這是因爲戰爭使我們相信，對英的提攜雖然不是出於任何協定的形成，但關於太平洋上幾個盟國重大利益的防衛上，彼此會作默契的信賴，因而，這種提攜，事實上即等於同盟。數年來，我們一方面看出這種需要，一面又發現盟軍想從菲律賓跳到香港，截斷華南敵人的通路這一計劃顯然是被阻止了。一九四四年底，美國參議員強森曾指責說：「倘使不是英人玩弄權術政治，我們早就收回了香港」，英國死心塌地地保持着香港，並不是爲着在太平洋廣闊無邊的海岸上，替盟國保留一個用以對付未來的侵略者的堅強據點，相反地，它乃是世代相傳「沒有永久朋友」的遺訓和玩弄強權政治手腕的成就，以至戰後的今日，由於辛勤所造出來的中英提攜都爲人所忘記了。

所以，我們可以說，這一代以及無數後代的中國人都將堅決地反對這一僅存的割據（因爲澳門可以隨時收回），我們所根據的並不是我們的祖先作戰失敗，信守着先人服仇的遺訓，而是由於大西洋憲章，開羅和莫斯科宣言，聯合國憲章等所顯示的信念所使然，倘使英國不肯承認這種偉大的賜與，那麼客觀情勢的發展將強迫我們有以承認的必要。

我們現在是面臨着一個比較二十年來收回租界，廢除外人在華特權等都更爲切實的問題，戰爭結束之後，世界所存在的三個軍力強大的國家，可能再加上第四個潛在的未來強大的中國（假使她能够統一的話），她們能够在亞洲發生偉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影響力的，現在顯然還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這些國家在戰時共同負起類似同盟所加上的責任，宣佈一種偉大的理想付諸實施，等到一旦解除了戰爭的重担，亞洲便立刻發現了她們之間潛在着的對敵性，癡結所在，無非是千百年來，列強的腦海裏所存在着的「勢力範圍」執拗的幻想。在英國方面，她一旦自動地交回香港，那就是表示遠東的前程將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在中國方面，我們如果能够竭力達到這一目的，那麼，當中國的臉上最後的一個「疔」被除去的時候，我們就會名符其實地達到一個強國所應當具備的對於領土自衛權和發言權的起碼條件。

筆者沒有理由相信，中英將爲着香港而終須訴諸決裂的方式，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不維護着盟國目前所僅僅剩下「還不至以武力相見」的最後一條路，筆者以爲，中國國內的情勢一旦改觀，則英國所採取的觀望的態度已經失去了一半，跟着我們就可以逆循鐵腕的外交輕易地完成這一目的，因爲唯有這樣，我們才可以促使英國選擇像對印度一樣「以友誼的方式」退出香港的一條路，他們將會感到：愉快的撤出，必然會比以武力堅守着更能博取廣大人類的同情，而又能無損於日後的願望。

像這樣的問題，我們還不應把目的僅僅的寄托在「一套理想之上，因爲理想往往是和手段不相容的，譬如說，和平的理想（或者是阿Q的精神）使我們忘記了國家最低限度的利益和安全，而幾乎使我們墜於腐化。從當前九龍所發生的問題來說，一方面我們可以證實英國對華的外交政策仍然是萬變不離其宗，另一方面，也就是最主要的一點，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外交當局無論碰到任何的事件，總是這樣的軟弱和無恥，這使我們不禁懷疑整個外交部的設立是否也是糜費公帑？我們的口中不斷地高唱着仁義道德，但心中又把和平所必須支付的代價輕易地爲恐懼與無恥所消滅，其結果就只有任外國人在中國爲所欲爲，並把自己行動的力量剝削殆盡，整個的中國也從此帶來了斯彭格萊所謂「與歷史末日而俱來的和平」。所以，自欺欺人的政策，和奴才式的外交（恕我借用學生們的標語）



，索察里尼却把報紙作為他私人的「政治演講台」，這個妙用被政治野心家奪去了；於是報紙面目全非，不但不能順適人民的需要，還時時麻醉欺騙了人民。

報紙受侮辱的結果是人民被犧牲，人類的幸福，世界的進步也一齊被葬送了。像無意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這些野心家的狂吠，已為衆所歎惜，因為熱烈地追求新聞自由，實在是消滅戰爭保障和平的不二法門。

目前我國的報紙，仍多依政治的經濟的背景而生存，很少能應人民的需要而產生。不是有人想把報紙作為「政治的演講台」，便是失意政客裝腔作勢的工具，御用之本質不變，民衆的痛苦也不除，現在一般民衆對於御用的報紙，毫無親切之感，反而疾首蹙額，表示厭惡，因為那是違反民衆利益的，民衆在這情況之下真是有口難分有冤莫訴，然而他們是多數，他們當然有發表意見的資格，有發表意見權利。

在這種廣大普遍而迫切的需要之中，真正為民衆的報紙自然容易產生出來，問題只在多數需要報紙的人民，他們並沒有創設報紙的能力，好大多數農人並沒有土地與多數的工人並無工廠一般。但多數人民的需要報紙，是天經地義的，在多數人民需要報紙的事實之下，報紙要希冀永遠停留於御用的形式，顯然是不可能的，政治野心家要永遠控制報紙，經濟壟斷者要永遠佔據報紙，也將是徒勞無益的。

一旦真正的三民主義政治實現，三民主義國家建設完成，就應實現「耕者有其田」，「工人有其器」，這是民生主義的要點，從民權主義的觀點，就要促成：「人民有其報」。人民沒有報紙，民權主義一定不能實現。

### (二) 潮流的趨向

時代思潮正向民主政治奔騰，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論出版之自由，不處置之自由，不受威脅之自由，宗教信仰之自由)即以言論出版自由為第一，戰事結束以後世界上的新聞統制立刻解禁，各國對於恢復新聞自由，作為復員工作的第一課。美國新聞界更一致吶喊：「惟有新聞自由，纔能保障世界永久和平」。要求將新聞自由列入聯合國憲章。美國國務院提議採訪新聞發放新聞自由及任何國家應允許各報接受世界其他部份的新聞兩項新聞自由。中國以建設三民主義為目的，新聞自由就是民權政

治的出發點，政府保障言論自由，也載諸政綱政策條文上和憲法的條文上，勝利後二個月(三十四年十月一日)政府即宣佈撤銷新聞檢查制度，各地反對政府的報紙，公開批評政府，作不利於政府的宣傳，政府也不能以任何的理理由去指制或剪除這種報紙，民主的怒潮已捲起了，要阻擋也阻擋不住的。

受了時代潮流的激盪，中國的民主運動也頗呈蓬勃發展，在這一個趨勢之下，中國的報紙顯然將有利於踏上它光明自由的大道，中國的報紙要揚棄它合理化的阻力，要實現它的確實在公眾的立場，無條件地獲得自由的環境，時機已漸成熟，在這時候，我們可以說真正的報紙就要在中國誕生了。

然而我們不能忘記，中國的報紙是在雙重的桎梏之下奮鬥掙扎以求生存，現在民主思潮捲到中國，無疑地，中國的報紙，將獲得新聞自由的待遇，但對於如何克服工業落後的桎梏，却並不同時有快意的收穫，當三十六年上期，全國各報發生了缺乏報紙的恐慌，原因是政府鑒於報紙大量進口，外匯的支出每年就上海一區而論即達一千一百餘萬美元，所以限制紙張進口，結果在中國又不能自造捲筒紙，既不准報紙進口，就等於致國內報紙於死命。「報業危機」已是一句口號，報紙喊救命，其聲至慘，報紙在這時代，竟意外地遭遇到「總崩潰」的災難，有人為目前報業的困苦描寫說「一哀中國無紙，二哀養報無財，三哀物價如馬，四哀交通如龜，五哀民主如燭，六哀國事如蘿」。內中第一第四兩點，正是說明在中國辦報缺乏物質條件的痛苦，比之政治條件的逆勢，實有「異曲同工」之態。

### (三) 演進的步調

新聞事業的榮枯，受政治的影響極大，現代中國的新聞紙，創始於清末葉，政治黑暗，對於新聞事業極多阻撓，「大清」關於報紙的「禁律」，既詳細又嚴峻，到了民國肇造，中國國民黨以民權主義號召，自然應該開放新聞，可是數十年來內亂頻仍，新聞的自由，隨時都因有戰事而受限制，民國以後，記者被殺，報館被封的事情依然層出不窮，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一日行政院始頒佈保護新聞記者令，原文有云：「查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與人民言論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能限制，訓政時期約法第八十五各條已明白規定，該省黨部以各地政府對新聞

人員不知愛護，甚且有任意摧殘情事，請通令保護，尙屬可行，准由內政部通令各省市府軍政部通令各軍隊及軍事機關，對新聞事業人員應切實保護。這是我國新聞自由發展史上最愜心的一頁，因此我們的新聞記者，現珍惜這光榮的待遇之下，一致以「九一」為「記者節」了。

抗戰時期，巨八年之久，以軍事「第一」，新聞自由的腳步縮了回去，待德日投降，世界各國的新聞檢查一律解禁，新聞自由，又成了時代的趨向，我們中國的新聞事業也自動地追求「新聞自由」的目標。

現代的人民，都有一個認識，對於報紙的橫受摧殘，要引起不快之感。如果某某報館被封，某某報人被害，不但不足以表示當權者的威風，反而顯出了他們的卑怯。如果不是心虛膽怯，何懼輿論的批評，孔夫子說過「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人民不敢說話，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正表示當權者的不開明，政治腐敗，揭不得。報紙中間「開天窗」，××或口口口，不但讀者看了懷疑生厭，就是執行檢扣的人員看了也覺不順眼，有點害羞，在英美的報紙，因為戰時的關係而檢扣新聞，但決不在版面上露出痕跡，這些××口口口，在新聞記者的眼光中，正是一個政府政治民主與否的尺度。因此執行新聞檢查的人，不能不自相矛盾地，一面檢扣新聞，一面却又不願意報紙上留有痕跡，但這究竟是難於作好的事。反之，在辦報的人方面，却很多以被檢扣為榮，報館封門，不妨再來，被處分一次，銷路却因而大增，於此可知妨礙新聞自由，實在不是一件光榮而應當的事。

觀於上述的現象，可知報紙向精神解放的路走，是一個自然的趨勢，自然演進的步調，以經提供在眼前。

#### (四)新聞史的黎明

事實上中國新聞事業，到現在還未嘗從自動發展的機會，政治上的桎梏並未完全解除，物質上的阻撓尤其嚴重。我們要使中國歷史的進程，依循中國新聞事業所追尋的途徑，顯然尚有所待。

#### 中國新聞事業的黎明，寄託於以下的三種情勢：

一、是政治民主化：政治不民主，對於新聞事業是莫大的阻力，中國新聞紙直到現在還不能以公眾的立場為立場，以自由的措施為措施，使報紙在本質上受了污蔑，失去了報紙應有的精神；現在我們要迎接中國新聞

事業的黎明，第一要期盼政治民主化的實現。

二、是建設工業化：在中國辦報紙，猶如無米為炊，猶如空中樓閣，俯仰隨人，而且生命的絕續，也持在外國人手裏，我們沒有紙張的生產，我們沒有印刷機的鑄造，我們沒有通訊器材的設備，我們沒有送報工具的使用，報紙的命運，不是自己所能掌握！我們如果使中國新聞事業獨立自立飛速發展，對於建設的工業化一個先決的條件。

三、是文字通俗化：中國文字，非多數人民所認識，據不精確的統計，識字人口僅佔總人口百分之一五，就此一點，縱然報紙辦得好能够使識字的人，人人都有報看，依然不能達到報紙普遍化的目的。目前一個重大的問題是百分之八十五的文盲，他們能否也享受看報的權利？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期待於教育當局的一切切實去掃除文盲，也期待於文字學家的創造或改革以減少方塊字的艱深，同時報人自己也應該考慮一種作風，就是不要再把新聞紙內容脫離羣衆生活的壞傳統謹慎地承襲勿失。

#### (五)新的課題

新聞自由的實現，是新聞史上劃期的一頁，新聞自由以前，新聞記者向各方面討生活，政治可以左右報紙的言論，經濟可以決定報紙態度，但到了新聞自由一旦實現，新聞記者只須忠於職業的精神，並不受支配於外在的勢力，反之外在的勢力，却必須傾聽新聞紙的發言。這種現象，我們稱為「從新聞事業史寫成歷史」。

從另一角度看新聞自由決不是說報紙可以不負責任，為所欲為的意思，反之，新聞自由時代的報紙責任，顯更要沉重十倍。從前新聞紙上有弊病，報人可以推諉本身應負的責任，說他們的立言是依循政府的意旨，好比新聞既經檢查，報社自可不負已經刊出的各項新聞的責任；但新聞自由實現以後，報紙便不能再把錯誤的過失，推在他身上，而應該由自己負責。美國報紙編輯該稿在發排付印之前，必須負責校看是非違犯誹謗之罪。

所以新報紙是需要「新報人」的，新報人應具備的條件有三：

①關於技術的：凡駕駛，攝影，游泳，速記，語言，社交，發行，廣告，編輯，校對，撰述，通訊等報紙業務上的基本工作技能；

②關於學術：新聞記者是「通才」一類人物，他必須常識豐富，經驗



充足，現在京滬報紙，還有登載日本戰犯「谷壽夫」消息標出「谷壽」兩字，北平某報登載槍斃盜匪新聞竟把監刑的一位上校大名也一併列入盜匪之中，予以槍決，結果道款三日了事，更有把外電中政府官吏或記者中國人名譯成中文時鬧許多笑話，比如把和平日報派駐舊金山記者「陸鼎清」譯成「丁清瑞」，把立法委員「簡貫三」譯成「管三樓」的，把法院中公審的「旁聽席」稱為「聽衆」等等。暴露新聞界的枯索與悲哀。新報人應該具有豐富的現代新聞知識的，如採訪，編輯，撰述，報業管理，資料搜集與整理等；

◎關於道德的：據來蘇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威廉博士訂新聞記者信條，有（一）職業精神，（二）服從公衆，（三）明思明論正確公平，（四）不自欺欺人，（五）爲社會幸福設想，（六）屏去賄賂，（七）真實純潔，（八）畏天救人，獨立不撓等數項。現代新聞道德，比如予人爲善，

積極進取，不落井下石，維護正義，互助精神等等，都是新報人應具的新聞道德。報人原來是覺世醒民的，必須自己正直無私，秉志忠純，然後能以其昭昭者使人昭昭。

#### （六）結 論

綜上所述，新聞史觀，可分兩個意義：

第一、即是新聞事業史的觀察方法。即新聞事業史，可分兩個時期，第一時期，報紙未曾定型，特點是新聞無自由，工業不發達的時期，這時期的新聞事業附屬於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之中。

第二、即是歷史的新聞觀。歷史的開朗進化，抑或塌蹶黑暗，反映在新聞事業的盛衰之中，如果新聞事業陷入困頓甚至崩潰，歷史一定黯然無光，反之新聞如果蓬勃向榮，歷史就光明璀璨。



## 英首相艾特禮的「中間路線」

·金治泰譯·

一月三日晚間，英首相克萊里蒙，艾特禮指控蘇俄所採政策係一種思想體系的，經濟的與戰略的新型帝國主義，現正威脅歐洲其他國家。

艾特禮從其官邸向工黨作第四次政治廣播時稱：「今日極端主義者，在擁護民主主義的偽裝下，其對壓制反對者，較之昔日之君主尤有過之而無不及，這豈不是一個諷刺」。他說：「我在此地可以說，我們英國人民在工黨政府領導之下，正在領導世界，一種今日保存我們歐洲文明的傳統必需的領導，這種領導非保守黨政府或自由黨政府所能辦到」。「今日在東歐的共產黨，控制了地主階級和資本家們的暴虐，已經剝奪了個人自由的幸福和政治上的民主，並且摒棄整個西

歐精神傳統」。「蘇俄歷史給吾人一個警告，沒有政治自由，集體主義很易步入歧途，并導入新的鬱抑與不合理之中，蘇聯共產主義所採政策，威脅歐洲其他諸國家之福利與生活，用一種新型的帝國主義——思想體系的，經濟的相戰略的」。

從另一方面看，艾特禮繼續說，美國則在政治範圍內確保個人自由，及維持基本人權。但美國經濟基礎爲資本主義，其特質是人民財富分配之不平衡。英國如西歐其他國家一般，在地理上和經濟與政治理論的觀點上，處於美國和蘇聯兩者之間。

「我們的任務是和平的去實現一個新的制度

，這制度包括個人自由，計劃經濟，民主主義與社會公道」。「這項任務，不僅吾人面臨着，就是所有西歐民主國家的政府，應接受社會新的觀念，依照新情勢之需更替政策」。「這項任務，非任何陳腐政黨所能完遂，亦非極權政黨如法西斯黨或共產黨所能達成」。

艾特禮總結說：「工黨政府目前實施的民主社會主義政策，意欲造成社會上每一個人皆可獲得良好生活的條件，并獲得政治的天賦權利之解放」。「工黨政府之領導不惟我們國家需要，亦爲歐洲所需要者」。據聯合社稱，艾特禮總理之攻擊，來自阿相之政治廣播，在那廣播中，他斥責國際共產黨主義較其在國內之反對者保守黨更



爲堅硬不化。

艾特禮黜斥共產主義，是在工黨秘書長毛列、非列普在全國作兩禮拜之運動後，非列普是去排制英國工組織中居控制地位的共產黨的。

英國勞工界今晚強調內閣總理艾特禮對英國人民之演說，雖然爲對共黨所作的政治廣播之一，但其國際意義較國內者更多。

他們強調英國首相第一次公開演述工黨領導

## 南美陰霾——阿根廷對玻里維亞的野心

◆◆◆ 阿爾勃脫希基斯，是「大街之血：屈羅吉洛的生活與統治」一書的著者，最近方由南美旅行回國

玻里維亞，這個被陸地圍住的恩地安共和國，一百二十二年內來始終是一個獨立國家，現在却已成爲懸宕在渴求權力與財富的拉丁美洲軍事領袖世家面前的一種誘人的獎勵品了。在十九世紀內，他們就已渴望它的白銀和黃金了，在二十世紀內它就供獻出了錫和煤油，以及國內未經開發的鉅大礦藏的潛在財富。

玻里維亞雖擁有各種自然資源，但永遠是一個弱國，它從未能憑藉本身軍事威力。反抗各鄰邦保護自己，南美的四個最大國家均在毗鄰：阿根廷、智利、巴西和比魯。但是這四個大國內有任何一國對之發生威脅時，那末其他的幾個巨人就會聯合起來制止這個侵略者。因爲凡是能够控制玻里維亞自然財富的國家，就能控制南美洲。

歐洲國家至民主社會主義之路，使德國共產主義和美國資本主義皆有所轉易。

工黨重要發言人時刻宣揚這種理論，但聲明作這種理論的領導地位的，却非所料，即以英相宣布的演說也並沒有說到上面的話。

我們不難說，艾特禮對此類思想之宣布已等候甚久，以待其經濟方面的成功，在他心中，欲以不可限量之權威宣布之。或者他已爲成長的徵

阿根廷首腦庇隆的許多次政治陰謀，其幕後目的即爲此事。庇隆因爲受阻否能使用武力對付玻里維亞，所以他就採取一種更陰險的但是非常有效的手段。

在一九四六年七月的玻里維亞革命以後，革命議會就提出文件上的證據，證明那已經傾覆瓜爾倍吐維勞洛埃爾獨裁政權，會與庇隆有同盟關係，而且計劃將玻里維亞淪爲阿根廷的一個屬邦

庇隆因爲他的玻里維亞軍閥朋友們已經失去政權，而且臨時政府也反對他的種種計謀，所以他就只能希望來一次反革命。他曾進行四次極大的努力想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前實現一次反革命政變，雖然每次均告流產，但已起了動搖正在苦鬥中的民主政治之機構的作用。

當審判官托麥斯孟其格弟爾齊領導下的臨時

象所左右，就是同時關係西歐的民主自由和計劃社會公理的歐洲政治勢力正等待這種領導。

去年十一月法國利翁勃倫也曾公開宣布此類政策，但他得不到國會的多數信仰。現在，艾特禮以政府作背景發言，這個政府在國內居於國會多數之地位，在歐洲，這個政府會爲形成馬歇爾計劃基礎一部分之十六國經濟合作會議之領導。

民主政府一旦成立時，倍諾斯愛勒的庇隆份子報紙，立刻就齊向孟琪和他的大臣們開放辱罵的炮火。二個月之後，有一個舊玻里維亞陸軍軍官曾經企圖謀害孟琪的性命，而有一羣革命暴徒，疑是一個軍人集團，就將這個自稱的刺客和二個維位洛埃爾的舊時政治走狗吊死了。庇隆立刻就同他的國會嚴責勒派茲政府，指斥它教唆這次暴徒行動。

當一九四七年正月內玻里維亞人民投票選舉一個立憲政府時。所有一切客觀的觀察家們都宣稱選舉是完全自由而民主的。可是庇隆的報紙却齊聲尖叫這次選舉是欺騙。在選舉結果尚未正式公佈之前，玻里維亞的反革命份子就去煽動鐵錘喇喇湖地區內的愛麥勒印安人，說是勒派茲政府已在計劃屠戮他們而且要沒收他的土地。然後

· 費雯譯 ·

他們便將武器和軍火運給印第安人，而他們所希望的暴動就發生了。暴動平息以後，因為政府已經佈告過在革命以後，玻里維亞軍人均不准保有任何武器，所以就對印第安人軍火來源舉行一次調查。不論被暴露出來的事實如何，他們的武器終不是公家製造的。調查結果牽涉到底隆，但政府也只能不予洩露了。

庇隆最強有力的武器是飢餓政策。他禁止一切裝運食物包括家畜和罐頭肉食在內的船隻，從阿根廷駛到玻里維亞去。當這個命令在玻里維亞革後立即實行時，玻里維亞人當時并未立刻就感到影響。但到了十二月內時，他們就顯然地遭到嚴重的食物缺乏了。臨時政府向美國呼籲求援。華盛頓却拒絕這個請求，藉口說因為別國訂購的糧食必需交付，所以不能再輸出糧食給玻里維亞了。此舉使玻里維亞差不多完全必須依靠庇隆。如果華盛頓堅持拒絕援助，玻里維亞就將必不能免地屈服於他的種種要求下了。

不幸地對於玻里維亞為謬列雪與霍斯却爾連領頭的獨立派各公司錫產所討的價格，華盛頓也予以拒絕。英國對於西蒙派迭諾煤礦的生產總額，早已訂有長期合同。一九四二年内美國政府曾簽訂一個訂購獨立派公司每年產額一萬七千噸的合同。這個合同已於今年滿期，霍斯却爾連代表獨立派，就與建設金融公司開談判，將價格自每磅六角九分增至七角六分，重訂合同。玻里維亞政府的賦稅收入全靠錫產輸出，各煤礦公司由玻里維亞政府作後援，爭辯說這所增的七分價錢是與一切礦產品的飛昂價格相合的。建設金融公司最初答允給七角二分，後來答允七角三分，

後來又答應七角四分，但玻里維亞政府堅持七角六分要求的立場，不肯退讓，堅決主張說除非能夠獲得這七角六分的價格，否則已經增高的生產費用必使錫礦無利可圖。

玻里維亞由於急切需要一個錫產市場，食糧逐漸減少，內爭弄得國內分裂，民主正在動搖不安之中，於是當恩列奎赫脫派在正月內被選為總統而在三月內任能時，培諾斯愛勒就成為給庇隆可以採辦的一只熟果了。培諾斯愛勒派出一個由一位特任大使率領的商務使節團，於二月份內始終盤桓在勒派茲地方，以儘量誇示寬洪大量的手段來促進庇隆的種種計劃——它答允以七角六分的價錢收購獨立派全部錫產總額，貸給一筆六千五百五十萬美元的借款，而且恢復糧運入巴西維亞的運動。庇隆所獲的報酬是玻里維亞在經濟上依賴阿根廷，這種經濟上的依賴在極短時期內必將造成為政治上的依賴。在協定中所規定的基金，其大部份均用於為未開發的玻里維亞所大需要的工業和運輸計劃。然而這些計劃，均受由庇隆任命的官吏們所控制的一個聯合委員會管理。赫脫派格總統的第一個大作為就是簽署這個貿易協定。條款之一限定玻里維亞須將獨立派在一九四七年內所能輸出的錫產一萬七千噸中，要將八千噸用船裝給阿根廷。這八千噸錫產立刻就開始裝運，第一批已在三月份內裝運出去，於是建設金融公司在落後一步以後，才重又急急趕來，答應出七角六分的價錢，才將那一萬七千噸中的九千噸錫產搶救到手中。

庇隆在獲得與玻里維亞所簽訂的商約以後，就對阿根廷國會宣佈說，建立阿根廷近代化陸軍的日子已經到來了。「我們的為全世界人民所尊

敬的和平主義者傳統是不夠的」，他說，「在一個已經武裝的世界中必須需要有一種最低限度的預見」。他宣佈說阿根廷陸軍應是共和國的衛士，而且應對「保衛美洲大陸南部」有所供獻。他的這許多演說，其用意不僅是在脅迫各鄰邦，但在暗示華盛頓，在另一次世界大戰的事變中，擁有一個近代化陸軍并有玻里維亞各種自然資源任有意支配權的驕傲佔有者的庇隆的阿根廷，必將是一個值得尊重的力量哩。

華盛頓對於一個泛美軍事聯盟的底稿熟慮已久。史普羅爾勃勒登曾經反對過此種聯盟。馬歇爾甚至在升任國務卿之前，人們即已認為他是此種聯盟主要保護者之一。庇隆之所以需要這個聯盟，因為希望美國在後就會將更多的武器與軍火送給他。

在他那次要求更大而更好的陸軍的演說中，庇隆講到了他的工業社會化綱領，這個綱領可為國家生產「軍火與戰爭資源」。他的這些話，對於美國內贊成泛美軍事同盟的擁護者們，都是大足安心的論調。然而對於玻里維亞以及其他各鄰邦，這些話却喚起了他們一種印象，看出他已有擴張的野心了。如果阿根廷控制了玻里維亞的各種礦產而且能從美國那裏領得武器，那末現在的威力足夠抵抗庇隆的唯一南美國家比魯，就將發覺它本身實際上已經虛弱無力。當然，如果美國軍事聯盟一旦組織成立的話，巴西亦必能從美國那裏受到物質援助。但是庇隆現在就已在建一個巨大的侵略的戰爭機器啦。

作為一個不可輕視的軍事力量，阿根廷就能變成為泛美軍事防禦計劃的拉丁美洲之樞紐。到那時侯美國將不得不全憑庇隆的保衛和尊重民主，始能確保和平。但是不論成立聯盟或沒有聯盟，庇隆的行為紀錄早已指出：誰能為他的種種利益服務得最好，他就站在誰一邊幫助作戰。

# 中國歷史上之中央各部

· 杜 衡 ·

## —中國政治制度史談之二—

講到中央的各部普通的看法，都以為古代六官的遺意，因為太宰司馬司空恰好與唐宋至清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相應。古代實際制度，固然我們無從確知，但照周禮所說，六官多半是執行事務的機關，與六部之純為行政監督機關者不同。周禮雖然未必說的是實行狀況，但在秦以前的封建政治中，也似乎不能發生行政監督的問題。然則各部從何而始呢？（歷代職官表也說後世以六部分配六官之不對，舉出杜佑以吏部為出於夏官之司士一說為證。足見古人也都知道其中委曲，不過普通人容易發生誤解耳）。

我們先要知道歷代各部長官——尙書——這個名稱之由來。尙書是西漢末年以後在宮禁中一部分地方替君主處理文書的官員。他們的職務本來不算很繁重的。但光武及以後的皇帝，不以事權假三公，所有政事自己直接裁決，於是尙書這個機關（當時謂之台閣，就是宮禁中一部分地方的意思）。代替了從前的丞相府，而成為庶政的總樞紐了。事體多了，所以要分曹。（好像現在的分司）。後來諸曹之中，又有吏部最為重要，於是別部也漸漸出現，又繼而部變成曹或司的上面一級，這種有各部的固定形式。

中央政府之所由組成，必須有一個總攬中央行政的最高機關，其中再分成各部門，分別負責，這似乎是古今通例。但是秦漢的初制，似乎並不完全如此。秦漢時代真正中央行政最高機關只是一個丞相府，所有關於設計指示觀察等職責都是丞相所轄的僚屬（史）分任，並沒有現在的所謂各部。其時所謂九卿如大司農廷尉少府太常鴻臚中尉等官，除大司農供軍國之用，（顏師古漢書注語）稍兼政務性質外，其他實在都是執行及業務機關，並不是丞相府的構成部分。所以九卿官署一直到清朝還多半存在，就是因為各有專管的事業，並非國家政務。否則既有六部之後也早應該將他們取銷了。

當時所以如此定制，因為中央對地方的關係非常簡略，除財物運輸之外運籌幣都可以聽地方自辦，其他更不消說，用不着很多的人來辦中央的政務。即以用人而論，郡縣吏都由自辟，中都官（中央官）所屬也各有系統，無須特設人事機關來管理，丞相的職掌，當真只要提綱挈領就行了。試看當日的分曹，一曰常侍曹主公卿事，一曰二千石曹主郡國事，只將中央與地方之事分開，而並未將事之性質分開，足見其無詳細分析之必要。但是隨時勢之變遷，就發生了幾件不能不由中央特設專管之事。比如用人，怎樣物色各種人才，怎樣任用，怎樣考核黜陟，尤其在社會輿論風氣抬頭的時代，是一個繁雜的問題。其次就是軍事，以前關於軍事的種種設備編制調遣，可以委權於地方及統兵將帥，而到了長期用兵的時候，則需要機密與統籌。又其次是財政，也隨着軍事的局面，必需有通整的籌劃。這種情形，是漢魏之間發生的。所以最早成立的是吏部，而繼有五兵度支等曹。

這樣組成所謂尙書省，與中書門下合成三省，而奠定中央最高行政機關的系統。到了唐代，六部的名稱確定了。每部置尙書一人，侍郎二人，

每部四曹，共二十四曹，（其首曹即用本部之名謂之頭司，其餘謂之子司）。每曹置郎中及員外郎。但是我們不能拿現在的習慣來推測唐宋之制。彼時六部隸於尚書省，都省之中有尚書左右司，每司各管三部，左管吏戶禮，右管兵刑工，左右司之上，才是左右僕射，左右丞，所以左右司有點像現在的總務司，而各部只等於一個合署辦公的行政院中分各科而已。並不像現在的部各有其獨立的衙署。（唐宋時尚書僕射居都堂當省之中，左為吏戶禮部，分三行，每行四司，右為兵刑工部，也分三行，每行四司，皆東西相向。從唐宋人筆記可以看出。即從現在的北平遺迹，還可以看出吏戶禮排在東邊，兵刑工排在西邊，仍是唐宋相沿之制。足見要明白古代政制精神，須注意於實物考證也。）自郎中以下，都稱為尚書吏部郎中，尚書司郎郎中，所以惟有僕射丞才是尚書省的真正長官。而尚書並沒有現在的部長身分。這是與現在制度似同而實異的地方。

尚書省在唐宋與其說是別的，不如說是中央命令傳達到各地方的樞紐。正如秦漢的丞相府一樣，他們只辦些照例的公事，這種公事，已經陳腐到任何人都能辦，無須於高等的才能了。於是真正國家重要的政務，又提出來另設機關來辦理。最顯明的例，就是財政一項，據舊唐書食貨志說：開元以前事歸尚書省，開元以後權移他官，由是有轉運使租庸使鹽鐵使度支鹽鐵轉運使常平鑄錢鹽鐵使租庸青苗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兩稅使，隨事立名，沿革不一。

詳細說來，還不止此。主要的是度支使鹽鐵使判戶部，通謂之三司使，三司使由宰相兼領，最為重要職務。若照理論來講，宰相已經無所不統，何必再立使名？戶部既有本部的尚書，何必再派一人來「判」？（判是高級的官管次級機關公事的意思）。但是當時實際情形，非此不可，若無這個新設的機關，另選賢能，集中經營，專靠戶部，是不中用的。久而久之，一切政務都不是尚書省所能勝任了。也有一半原因是由於五代的霸王另有一班親信的私人，而不信任正式官吏。還有一半原因，是正式官吏數太多，已經變成虛銜而不是實職。及至宋初，簡直無一事不另設機關。譬如吏部之職移於審官院，禮部之職移於禮儀院，兵部之職移於樞密院，刑部之職移於審刑院等等，在這時候，吏部尚書不但不經管銓政，連吏部本身的事也與他不相干，他就算尚書階級中之第一級而已。（宋代以部的順序定階級，六部分為左右兩列；每列分三行，所以吏兵為前行，戶刑為中行，禮工為後行，官吏銓資，由後行轉中行，由中行轉前行。假如有入自工部侍郎轉刑部侍郎，是升官而不是轉職）。吏部尚書判工部才管工部的事，工部尚書判禮部才管禮部的事，自尚書以下各級京官，都無一定員額，他們拿了這個身分，內而判各司，外而知府州，那才是他們的本職。猶如現在陸軍中將是他的身分，第幾師團長才是他的本職，一樣情形。這樣一來，定制全紊亂了。王安石預備變法的時候，他也不能不另設機關調派許多人員作為他的新政籌備處。（就是設置三司條例司）他最後促成元豐新官制，就是依據當時的習慣，逐漸已成的趨勢，分寄祿官與職事官為兩個分野，使尚書都省仍為庶政樞紐，六部職掌一律還原，而寄祿官專以什麼大夫什麼郎為名，不再名為什麼尚書什麼郎中什麼侍郎什麼丞了。元豐新官制不能在改制大體上有什麼革新，在新政之中，算是最溫和而保守的，不過總算能正名定分而已。但實際上有些駢枝機關仍不能去。

中央各部的規則，惟有明代最為謹嚴而合理。本來明初是沿元制，在中書省之下設六部，此時尚書省已廢，門胥枝機關不能存，三省變為一省，又將要走回秦漢的舊路了。因為胡惟庸一案，明太祖毅然師心自用，連中書省也不要，將六部升為獨立的機關，直屬於皇帝，等於以六部尚書輔佐君主分掌國政，倒很像現代內閣中的國務員樣子。（就是沒有國務總理）於是尚書成為最高級的實職，（唐宋是正三品，明升為正二品，清又升為從一品）。而吏部尚書以首席的資格，隱然如周制之太宰為六官之長。（吏部尚書在體制上有特別優異的地方，雖然事實上不能充任首相，而其地位仍是很尊貴的，有些習慣到清代依然保存）。

這一次的改革，在中國政制史上却起了一種較大的影響。不可不細為討論。明太祖之建國，是極富有開創精神的，他將秦漢以來許多演變的線

索都斬斷了，而從頭另起。這其中的委曲計劃，當然不是他本人能力所能及，在他後面發蹤指使的，是浙東的一派儒生。自宋末以來，暗成一種團結，乘時以發揮其政治思想。他們以復古的面貌為掩護，針對當時的積弊而企圖增強來自田間的士大夫力量，以築成政治核心的基礎。關於這一節，我們不能不略涉全部以便推測其真象。大約明初政制的改革，可以歸納成以下幾點：第一是封建制與郡縣制的調和，封建制在君主心目中總是不能忘情的，儒生復古政策中，如果不安置安當，也決不能相安。所以在郡縣制完全不動之外，又加上參伍錯綜有名無實的封建制。這些分封之王，等於坐世襲的監牢，徒然使皇室的子孫更加削弱，把握不到實際政權。第二是民間智識階級的鼓勵。明太祖屢次用不測的手段，提拔秀才們出任要職，而明代的定制，每科進士出身的人立刻分布於部曹知縣及迴翔台閣，慢慢的可入政地。其次部曹知縣，都有實權，很可作威作福。要是入了台諫，更是遇事生風，人人望而生畏。即使休官下來，還可以作個鄉紳，進則向朝端勾結，謀開復，退則在他的鄉里把持地方，干預公事。明代的君主信任什麼人呢？第一當然是內官，第二就是士大夫了。內官又從何而來？他們也來自田間，自然選於受了他的故鄉的士大夫影響，所以明代擅權的內官，都有士大夫作背景，如果不是他們互相利用，決不致因為內官而引起朝論之水火。即如魏忠賢一事，魏黨之中實在有些士大夫在內，其所以附魏，多半因為鄉土關係，因為附魏而受人指摘，則他們為自衛計，也不得不取報復的行為，所以三朝要典一案，弄到南都偏安，還要嘵嘵不已，就是士大夫自己分岐破裂仇視的極不良現象。但是君主孤獨的坐在深宮之中，只好聽他們的擺弄，以至於束手待斃了。第三是延推制度。政權中之最要一點自然是用人，明制中已經拿主要的銓敘權規定在吏兵兩部，而兩部的負責人一定是士大夫。至於最高級官吏之任用，向來是宰相與君主造膝密陳的，自從行廷推制度以後，內而尚侍，外而督撫，甚至於預機務入閣的人選，都由在廷羣臣公開擬議。要專從這一點形式來看，可以說明代的政治是民主到極點，至少是士大夫完全包辦成功了，所謂明代的君主，連選擇宰相這一點最後實權，都不曾把握住。（不像清代的君主可以從宗室勳戚外藩將帥中選擇輔助之人，明代却只限於翰林出身的一種人，宗親武臣都不能預政）。所以清朝的君主極厭惡這種制度，而決然廢去。第四是台諫獨立制度。關於這一層，另章詳說。但在這裏所可提到的，就是明代的言官已經超出了前代的台諫範圍，任何人都可肆意譏評，而且存心要摧毀君主的威嚴，使他不得不屈服於一種士大夫之心理支配，這是明代的一種特點。第五是內外平衡的精神。明代政制比前代進步的地方，就是內外輕外重內輕兩種缺點都不太甚。中央確有號令的能力，而地方也有因地制宜的自由。督撫權位固然很重，但決不能像唐朝藩鎮的擁兵極，不避專權之嫌而已。斷不會像秦操懿草一般非篡奪不可。為什麼呢？宰相督撫都是士大夫出身的人，士大夫要直接化家為國，必至於失去其本身之憑藉。魏晉的士大夫與明清的士大夫不同，前者之勢力完全建築於鄉里宗族之上，後者則除此以外還有師友淵源學術思想宗派的關係，重疊勾鎖起來。所以一個人的隸屬問題，不容易確定，也許在鄉里關係上屬於甲黨，而在思想上屬於乙黨，於是仇之中有友，友之中有仇，攻擊對方固然不惜用種種手段，但是也必不肯不留餘地，同時對同黨的擁護，也必有其相當的限度，過了這個限度，內部本身也許又分裂，而擁護的熱誠也減少了。這種現象，北宋時代已經很顯著，到明朝更甚，所以士大夫的特性，儘管是囂張，但是要他們專心一志擁護支持一種政權却不肯的。他們正利用在旁邊冷語譏評的便宜，而決不願親身冒險去作攻擊的目標。宋以後象徵治者階級的皇室久已不是而且一直是士大夫以外的人，士大夫始終不居這個最後的地位。所以到了明代，經過班士大夫的苦心的，確把以前外戚權臣藩鎮諸王的種種禍根都清除了，只剩一點內官的餘毒，還待最後的廓清而已。

（未完）

# 金城銀行

總行：（上海江西路二〇〇號）

辦理商業銀行  
一切業務兼營  
儲蓄信託業務

電話：（一二四〇〇）

# 浙江實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營儲蓄信託國外匯兌

總行：上海福州路一二三號

電話：一八〇五〇

分行：上海虹口 杭州 漢口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  
年創立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信託外匯倉庫

總行：上海甯波路五〇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

本埠分行：南京西路 林森中路 愚園路 八仙橋 虹口

提籃橋 徐家匯

外埠分支行處：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實錫 長沙 南昌 漢口 武昌 蕪湖

南京 鎮江 常州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北平 天津 青島 濟南 蚌埠

## 團體分紅儲蓄

每戶十五萬元 每戶十萬元

**伍萬萬元**

種乙 有六次獨得紅利

**壹萬萬元**

種甲 有六次獨得紅利

及四十八個一仟萬元之機會

種乙 有六次獨得紅利

及五個一仟萬元之機會

儲蓄 致富 勿失 機會  
短期 紅利 多會 儲蓄  
各大 代理 銀行 均可 儲蓄

中央信託局

地址：上海天津路二七九號